

# 苏鲁黄海沿岸地区史前至商周时期的 石椁墓研究

白云翔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济南 250100)

## 目 次

- 一 石椁墓的发现及其文化性质和年代
- 二 石椁墓的类型、演变与墓地
- 三 石椁墓的发生与扩散及相关问题
- 四 余论

江苏和山东两省的黄海沿岸地区(以下简称“苏鲁黄海沿岸地区”)作为海岱历史文化区〔1〕的东部边缘地带,在新石器时代乃至夏商时期,其历史发展进程和文化面貌总体上说与海岱中心地区是基本一致的。就墓葬类型而言,同样都是流行竖穴土坑墓以及竖穴土圻木棺墓或木椁墓,此为学界所熟知。但苏鲁沿海地带还存在一种在竖穴土圻中用石头构筑椁室并用石板或石块加以覆盖的石构墓葬,只不过因发现地点分散且数量较少,虽有学者对部分石椁墓有所论及〔2〕,但迄今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更缺乏系统的研究。实际上,这种类型的墓葬不仅对于海岱历史文化区史前乃至夏商周时期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黄海沿岸地区文化交流和人群迁徙的考察颇具学术意义,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专门研究。

关于这种类型的墓葬,以往学术界称谓不一,称之为“石棺墓”、“石板墓”、“石椁墓”乃至“积石墓”〔3〕者皆有之。基于棺作为装敛死者的葬具应当有底并且需要移动,而椁往往作为墓室结构的一部分是在墓室中构筑且一般不需要移动这样的理解和认识,这种类型的墓葬以“石椁墓”称之为宜。本文拟先对苏鲁黄海沿岸地区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石椁墓资料进行系统梳理,进而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就相关问题进行考察。

〔1〕“海岱历史文化区”或“海岱文化区”,是指“以渤海、黄海、泰山(岱)、淮河下游(故道)为显著标志”的一个历史文化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人文地理区”。参见高广仁、邵望平:《海岱文化与齐鲁文明》,1—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2〕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不少学者在相关论著中曾论及或提及苏鲁沿海地带的部分石椁墓遗存。参见严文明:《东夷文化的探索》,《文物》1989年第6期;栾丰实:《东夷考古》,360—363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

〔3〕王锡平:《胶东半岛夏商周时期的夷人文化》,《北方文物》1987年第2期。按:该文将乳山南黄庄石椁墓称之为“积石墓”,但在后来发表的考古简报和报告中又改称“石板墓”、“石椁墓”和“石棺墓”。

## 一 石椁墓的发现及其文化性质和年代

苏鲁黄海沿岸地区石椁墓的发现和确认始于 1975 年日照东海峪遗址的发掘,迄今已在江



图一 苏鲁黄海沿岸地区史前至商周时期石椁墓发现地点分布示意图

苏和山东发现六处以上〔1〕,发掘清理计一百二十四座以上〔2〕(图一)。这里大致由南而北依次就其发现概况、丧葬习俗和随葬品等加以概述,并就其文化性质和年代一并进行讨论。

### (一) 灌云大伊山墓地

大伊山是江苏灌云县城北约 2 公里处的一座海拔 226 米的孤山,地属灌云县伊山乡,北距连云港市 33 公里,东北距燕尾港 42 公里。大伊山墓地位于大伊山东麓清风岭的岗地上,海拔高度为 8 米,地势西高东低,墓地范围约 3000 平方米。1985 年的第一次发掘,在墓地西北隅残存的 200 平方米的范围内发掘清理新石器时代墓葬三十八座,其中有三十七座用薄石板

砌成墓椁(唯 M32 无石构葬具)。骨骼保存完整者为单人仰身直肢葬,有十六座墓主头部覆盖红陶钵,头向在 60 至 90 度范围内。其中三十五座有随葬品,最多的一墓有八件,三座无随葬品。随葬品有陶鼎、釜、壶、钵和罐等陶器,石斧、锛、凿和镰等石器,璜和玦等玉器,以及骨角器。陶器大部分放置在头端或足端,石器大多置于手侧,玉璜和玉玦分别在颈部和耳部〔3〕。1986 年春,在墓地西北部的北部偏东和南部偏西处进行了第二次发掘,两处相距约 40 米,发掘面积 350 平方米,清理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石椁墓二十四座。其中,发掘区西南角清理的

〔1〕 苏鲁黄海沿岸地带发现石椁墓的地点实际上要多于六处。2012 年冬,文登阳里店石椁墓发掘期间,在发掘区小北山东北约 400 米处的另一个小山包石岗山上调查石椁墓一座(M15),因未正式发掘,本文暂且将其归到阳里店墓地中叙述,实际上应当是一处单独的墓地(烟台市博物馆、威海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文登市文物管理所:《文登市阳里店墓地发掘简报》,《海岱考古》第七辑,科学出版社,2014 年)。

〔2〕 日照东海峪遗址三个阶段的遗存中均发现有石椁墓,但尚未详细报告,每个阶段的石椁墓这里暂按一座计。

〔3〕 连云港市博物馆:《江苏灌云大伊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 年第 2 期。

六座(M64—M69)与第一次发掘 T1 中的二十座(M1—M20)属于同一墓区,东北角清理十七座,M40 远离这两个墓区。这次发掘的墓葬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在 66 至 88 度之间。其中十三座墓无随葬品,有随葬品的十一座,随葬品的放置位置与第一次发掘的墓相同,头部覆盖红陶钵的墓有一座。出土随葬品计二十件,包括鼎、釜、钵和碗等陶器,镑、砺石和带槽石器、骨凿、玉珠和绿松石坠等<sup>〔1〕</sup>。大伊山墓地两次发掘墓葬计六十二座,其中石椁墓六十一座。

关于大伊山石椁墓文化性质和年代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第一次发掘者认为,大伊山遗址与邻近的二涧村遗址和大村遗址同属一个文化系统,而大伊山石椁墓“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目前也是所知最早的石棺葬遗迹”,“大伊山墓葬的年代,从文化面貌上判断,它晚于二涧村、大村遗址墓葬,与大汶口文化的早期类型或与马家浜文化的早期类型比较相近,大约距今 6000 年左右”。第二次发掘者认为,“大伊山遗址是海岱历史文化区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早于大汶口的一个文化类型”,“其相对年代晚于北辛,略早于青莲岗”,“大伊山遗址的绝对年代距今约 6500 年”。据学者研究<sup>〔2〕</sup>,北辛文化可分为三期六段,其年代为距今 7386—6110 年,早期为距今 7000—6600 年,中期为距今 6600—6300 年,晚期为距今 6300—6100 年;江苏淮河以北区域的连云港二涧村、大村、大伊山和沭阳万北等遗址的北辛文化遗存可划分为苏北区的“大伊山类型”(又称“二涧村类型”<sup>〔3〕</sup>);苏北地区的北辛文化遗存,至少可以分为两期,早期以二涧村墓葬、大伊山和万北部分遗存为代表,出土遗物与北辛文化中期的同类遗物较一致,其年代相当于北辛文化中期后段;晚期以大伊山、万北的部分遗存为代表,与北辛文化晚期时代相当;“大伊山墓地可以分为三期,早期以 M15、M29 等为代表,中期以 M39 等为代表,晚期以 M32 等为代表。分别属于北辛文化中、晚期和大汶口文化早期”;而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的年代为公元前 4200—前 3500 年<sup>〔4〕</sup>。以此为据,大伊山石椁墓属于北辛文化中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存,其绝对年代或可推定在公元前 4500—前 3500 年之间。

## (二)日照东海峪遗址

东海峪遗址位于山东日照东港区石臼所(原日照县石臼所公社)东海峪村西北,东临黄海,西有奎山,面积约 8 万平方米,1973 年和 1975 年先后两次发掘。1975 年秋发掘 800 平方米,文化堆积分为上、中、下三个文化层,“它们代表着三个不同的时期,然而,它们之间又有着明显的联系,说明这是连续发展的三个时期”,“而且是三个互相衔接的时期”;发掘墓葬十八座,分

〔1〕 南京博物院、连云港市博物馆、灌云县博物馆:《江苏灌云大伊山遗址 1986 年的发掘》,《文物》1991 年第 7 期。

〔2〕 栾丰实:《北辛文化研究》,氏著《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年。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274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

〔4〕 栾丰实:《大汶口文化的分期和类型》,氏著《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年。按:也有学者认为,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年代为公元前 4200—前 360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292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

属于三层(下层二座、中层一座、上层十五座);“这里三期墓葬的葬式和葬俗上相同,如人架都是仰身直肢葬,头向西北,器物基本组合和墓葬结构上都有长方形土圻或长方形土圻石椁等都比较一致,表明这些墓主人属于同一部族”〔1〕。据此可暂且认为,三个文化层中都发现有石椁墓,但其具体数量、结构及其特征等因未详细报告而无法详知。

关于东海峪遗址的文化性质和年代,发掘者认为,下层墓葬应属大汶口文化晚期,上文化层属龙山文化时期的早期,中文化层具有从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性质。现在一般认为,大汶口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其绝对年代,早期为公元前 4200—前 3600 年,中期为公元前 3600—前 3100 年,晚期为公元前 3100—前 2600 年〔2〕。据学者研究,海岱龙山文化可分为六期及十个小段〔3〕,其绝对年代在公元前 2600—前 2000 年之间,每一期的绝对年代大约在一百年上下,“东海峪中上层墓葬属于龙山文化最早的遗存,东海峪下层墓葬等,则属于大汶口文化的最晚时期”〔4〕,“东海峪中层墓葬正是所谓的大汶口和龙山文化之间的过渡时期遗存”〔5〕。基于上述,东海峪石椁墓的年代大致可推定在公元前 2700—前 2500 年之间。

### (三)日照苏家村遗址

苏家村遗址位于山东日照卧龙山街道苏家村和刘东楼村交界处,北、西、南三面环山,东面向海。1934 年发现,名为刘家楼遗址,1972 年更名为苏家村遗址,1995 年以后曾进行过多次调查。2011 年进行全面调查和勘探,探明它是一个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的环壕聚落,总面积近 9 万平方米。2019 年春对遗址东南部进行发掘,发掘面积约 600 平方米,清理墓葬七十九座(其中结构及年代明确者六十九座),以及大量房址和灰坑等遗迹,分为三个阶段。仅就墓葬来说,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墓向东或东南(晚期阶段出现南北向墓葬);早期阶段十二座,其中四座为石椁木棺墓(M39 等);中期阶段十七座,其中一座为石椁木棺墓(M59);晚期阶段四十座,其中石椁墓三座,包括土圻石椁墓二座和石椁木棺墓一座;三个阶段的石椁墓计八座。就随葬品而言(含非石椁墓),早期阶段约半数墓葬未见随葬品,有随葬品者一墓三至九件不等,有鼎、鬻、罐、圈足盘、折腹壶、觚形杯、高柄杯等陶器,以及磨石和残石器;中期阶段随葬品有鼎、鬻、罐、壶、觚形杯、高柄杯等陶器,以及猪下颌骨等;晚期阶段有的墓无随葬品,但有的墓多达四十余件,包括鼎、豆、鬻、甗、罐、壶、盆、圈足盘、高柄杯、壶形杯、筒形杯、器盖和纺轮等陶器,以及石凿和石料等〔6〕。

〔1〕 山东省博物馆、日照县文化馆东海峪发掘小组:《一九七五年东海峪遗址的发掘》,《考古》1976 年第 6 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292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

〔3〕 “海岱龙山文化”,学界曾先后称之为“典型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又,本文中除特别注明者外,“龙山文化”即指“海岱龙山文化”。

〔4〕 栾丰实:《海岱龙山文化的分期和类型》,氏著《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年。

〔5〕 栾丰实:《简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过渡期遗存》,《江汉考古》2021 年第 6 期。

〔6〕 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东日照市苏家村遗址 2019 年发掘简报》,《考古》2022 年第 8 期。

关于苏家村遗址的文化性质和年代,发掘者认为,其“主体遗存年代以大汶口文化末期至龙山文化早期为主,部分可延续至龙山文化中期前段”;三个阶段的遗存是连续发展的,在年代上无大的缺环。按照海岱龙山文化六期十段说及其年代观,“苏家村遗址早期遗存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末期至龙山文化初期;中期遗存的相对年代下限或可至龙山文化第一期前段;晚期遗存相对年代跨度较大,年代上限可至龙山文化第一期后段,年代下限大体在龙山文化第三期前段或稍晚”,而炭化植物种子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多数集中在公元前 2500—前 2200 年”。基于上述,苏家村石椁墓的年代大致可推定在公元前 2700—前 2400 年之间。

#### (四)诸城石河头墓地

石河头墓地位于山东诸城市区东南约 30 公里的林家村镇石河头村北岭的南坡上,地处吉利河和小北河两河交汇的台地上,南距黄海约 25 公里,遗址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1980 年在调查中发现石椁墓残迹,1986 年对遗址西南部已经暴露的二座石椁墓进行清理(编号 86M1、86M2)<sup>〔1〕</sup>。1997 年秋,为配合道路施工,在遗址西侧抢救性发掘墓葬十四座,其中石椁墓十三座(M1—M13),竖穴土坑墓一座(M14)<sup>〔2〕</sup>。1986—1997 年间,计清理石椁墓十五座。均为单人葬,头向东南;有四座墓(大多毁坏严重)无随葬品,有随葬品者一墓最多不到十件;随葬品均为陶器,有鼎、豆、鬻、罐、壶、盆、钵、觚形杯、高柄杯和器盖等。

关于石河头石椁墓的年代,1986 年的调查者认为,其年代“与东海峪遗址中文化层墓葬相当,而晚于下层墓,属龙山文化早期遗存”。1997 年的发掘者认为,随葬的陶器“既有具有大汶口文化晚期特征的陶器,也有具有龙山文化早期特征的陶器。属于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中间类型”,“石河头遗址 M3 应属于大汶口文化系统;其他墓葬亦多属于山东龙山文化系统”。最新研究表明,石河头“墓葬之间的时间跨度较小,均属于同一个时期”,其“整体特征,与(杭头 M4 和 M5 为代表的)杭头 B 组基本一致,时代应该大体相当”,而杭头 B 组墓葬“代表了大汶口文化晚段和龙山文化早段之间的一个过渡时期”,“将这一组遗存所代表的时间段归入大汶口文化,放在大汶口文化晚期最后一个阶段”,“石河头石椁墓地,基本上属于这一时期”<sup>〔3〕</sup>。若此,石河头石椁墓的年代可推定为公元前 2700—前 2600 年。

#### (五)文登吻里店墓地

吻里店墓地位于山东文登西北约 20 公里的界石镇吻里店村北的一座被当地称作小北山的山包上,海拔 105 米。该墓地发现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2010 年对已经暴露于地表的二座墓(M1、M2)进行清理。2012 年冬,采用开探沟的方式进行发掘,布设南北向探沟十八

〔1〕 诸城县博物馆:《山东诸城史前文化遗址调查》,《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 年。

〔2〕 诸城市博物馆:《诸城市石河头石椁墓清理简报》,《海岱考古》第七辑,科学出版社,2014 年。按:发掘报告的概述部分称清理墓葬计十四座,其中石椁墓十二座、土坑墓一座、不明者一座。根据发掘报告的墓葬分述,实际上是石椁墓十三座、竖穴土坑墓一座(M14)。

〔3〕 栾丰实:《简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过渡期遗存》,《江汉考古》2021 年第 6 期。

条,发掘面积 1000 平方米,清理石椁墓十二座(M3—M14)。这十四座石椁墓均为单人葬,除一座为南北向外,其余皆为东向或东南向。大多有随葬品,但数量较少,最多者一墓八件;以陶器为主,有鼎、罐、壶、碗、豆、器盖和纺轮等,另有石凿和石斧等。2012 年进行发掘的同时,对邻近区域进行调查,在小北山东北约 400 米处的石崮山上调查发现同类石椁墓一座(M15)。发掘者称,附近的“石崮山和其他山岗也发现了石棺墓或相似的石板,说明在周边山地和丘冈也存在这种石板墓,或者说这里可能存在一个大的石棺墓葬群”〔1〕。

关于吻里店石椁墓的文化性质和年代,发掘者根据墓葬出土陶器种类、器形及器物组合等,认为“吻里店墓地的时代应为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阶段”。根据海岱龙山文化六期十段说及其年代观,吻里店石椁墓的年代似可推定为公元前 2700—前 2500 年之间。

#### (六)乳山南黄庄墓地

南黄庄墓地位于山东乳山县城以东约 24 公里的南黄乡,墓葬集中分布在南黄庄村东、西、北三面的坡地上。1977 年发现,因位于南黄庄村西南的南斜山村东北,故曾称之为南斜山墓地。1979—1982 年间,先后做过多次调查。1983 年秋,在南黄庄村东北部采用探沟法进行发掘,开探沟十五条,发现墓葬十六座(M1—M16),并对其中的十五座进行了清理(M13 因位于路下未清理)。同时,在墓区西南部即南黄庄村东部发现了同时期的居住址,另对南黄庄村西断崖上暴露出的六座墓葬(M17—M22)进行清理(其中 M22 因残甚未全部清理)。发掘报告称,发现的二十二座墓葬中,有十五座石椁墓(即有盖无底石椁木棺墓)、五座石棺墓(即有盖有底土圻石椁墓),M13 和 M22 形制不清。可辨葬式者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除个别墓葬外,头向大多为东北向,一般在 30 至 70 度之间。除 M20 和 M21 为儿童墓未见随葬品外,其余各墓都有随葬品。随葬品数量不多,一墓一至八件不等,大多放置在椁内一隅的高台上。出土随葬品包括鼎、簋、鬲、罐等陶器六十八件,铜镞十一件以及石坠饰一件〔2〕。

关于南黄庄石椁墓的年代,发掘者根据随葬陶器组合及其器形、质地和纹饰等并参考地层关系,将其分为三组(M13 除外):甲组墓,四座(M5、M11、M14、M16),随葬品以陶鼎、鬲、罐组合为主;乙组墓,三座(M2、M7、M15),随葬品以陶罐、簋组合为主;丙组墓,十二座(M1、M3、M4、M6、M8—M10、M12、M17—M19、M22),随葬品以陶鬲、簋组合为主。三组墓年代依次衔接,即甲组墓→乙组墓→丙组墓,可视为一个大的时期,其年代大致推断为西周中晚期〔3〕。有学者将南黄庄石椁墓遗存归为珍珠门文化第五期,并认为其“年代可定为西周早期晚段或中期

〔1〕 烟台市博物馆、威海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文登市文物管理所:《文登市吻里店墓地发掘简报》,《海岱考古》第七辑,科学出版社,2014 年。

〔2〕 北京大学考古系、烟台市文管会、乳山县文管所:《山东乳山县南黄庄西周石板墓发掘简报》,《考古》1991 年第 1 期;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乳山南黄庄石椁墓》,《胶东考古》,文物出版社,1999 年。

〔3〕 关于南黄庄石椁墓的年代,1991 年发表的简报认为,“将南黄庄墓地的年代定在西周中、早期比较合适”;1999 年发表的发掘报告认为,“南黄庄墓地的年代亦应定为西周中晚期比较合适”。

早段”〔1〕。也有学者认为，南黄庄石椁墓的年代为西周中期前后至春秋早期前后〔2〕。综合各家之言，南黄庄石椁墓的主体年代或可推定在公元前9世纪前后。

至于南黄庄石椁墓的文化性质，发掘者认为，与南黄庄石椁墓出土陶器相同的材料在乳山多个地点有所发现，但在胶东半岛中部及其以西地区尚未见到；与此同时，在胶东半岛东南部的乳山、文登和荣成一带与胶东半岛中西部的黄县、蓬莱、烟台和莱阳一带相同的西周遗存则尚未发现。因此，南黄庄石椁墓遗存是具有浓厚地方特点的土著文化遗存。南黄庄墓地的出土器物，“显然继承了长岛珍珠门遗址的文化特点。如南黄庄墓葬与遗址中出土的鬲、高、簋与珍珠门遗址的承袭关系比较清楚。更重要的是在南黄庄遗址中发现了与珍珠门遗址相同的文化遗物”。一般认为，“珍珠门文化应主要属于商代晚期，其年代下限已经进入西周早期”〔3〕。关于其族属，发掘者结合文献记载推论，从长岛珍珠门遗址到乳山南黄庄墓地的材料正是文献记载中的夷人文化遗存，“南黄庄墓地的族属很可能是嵎夷当中的一支”〔4〕。

总起来看，在苏鲁黄海沿岸地区，石椁墓的发现地点和数量虽然不算多，但自南而北分布地域甚广，其年代自距今6500年前后直至2800年前后，时间跨度长达3000年以上，并且分属于多种考古学文化，其本身及其所反映的历史文化问题，值得探究。

## 二 石椁墓的类型、演变与墓地

苏鲁黄海沿岸地区石椁墓的发现概况、丧葬习俗、随葬品以及文化性质和年代等如上所述，这里主要就其墓葬类型及其演变和墓地进行分析。

### （一）石椁墓的类型学分析

就墓葬结构而言，苏鲁黄海沿岸各地的石椁墓既有明显的共性，同时又有诸多差异，为对其进行类型学分析提供了可能。就其共性来说，主要是基本结构及建造方式大致相同，即先挖建长方形竖穴浅土坑，并且土坑一般口大底小，底部略作平整，然后再在土坑内用石板或石块构筑石椁室。椁室均为单室，平面形制为窄长型，即长度与宽度之比为2:1及以上，并且一般是头短宽、足端窄，其上用石板或石块覆盖〔5〕。根据石椁室底部的有无，可分为两大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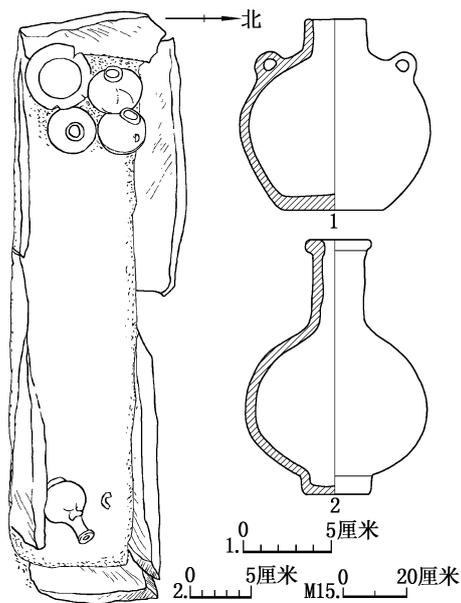
〔1〕 刘延常：《珍珠门文化初探》，《华夏考古》2001年第4期。

〔2〕 王青：《海岱地区周代墓葬研究》，33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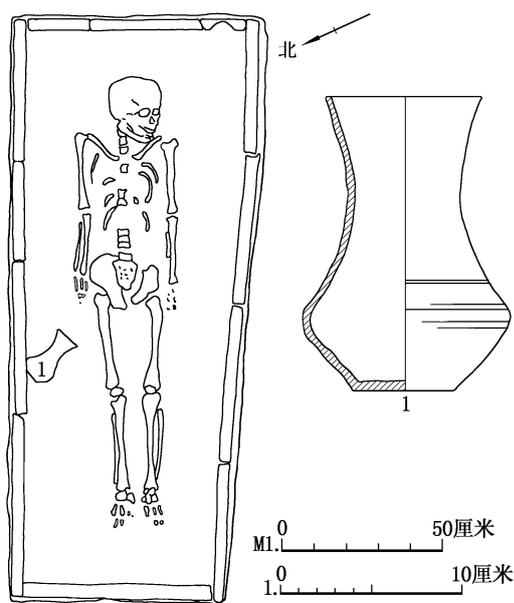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46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4〕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乳山南黄庄石椁墓》，《胶东考古》，文物出版社，1999年。按：关于珍珠门文化的族属，大都认为属于夷人的一支。或考证为夷人中的胶鬲一支（方辉：《胶东半岛地区商代土著文化——珍珠门文化》，《中国文物报》1997年8月10日第3版）；或认为“珍珠门类型遗存应是嵎夷创造的，会泉庄类型遗存应是莱夷创造的”（刘延常：《珍珠门文化初探》，《华夏考古》2001年第4期）。

〔5〕 1985年大伊山发掘的三十七座墓，发掘报告虽然称“没有发现明显的墓坑痕迹”，但该墓地1986年的发掘表明，其建造及结构是先挖一竖穴土坑，然后再在四壁立置石板并用石块覆盖。



图二 大伊山 M15 平面图及出土陶器  
1. 双耳壶 2. 长颈壶



图三 石河头 86M1 平面图及出土陶器  
1. 折腹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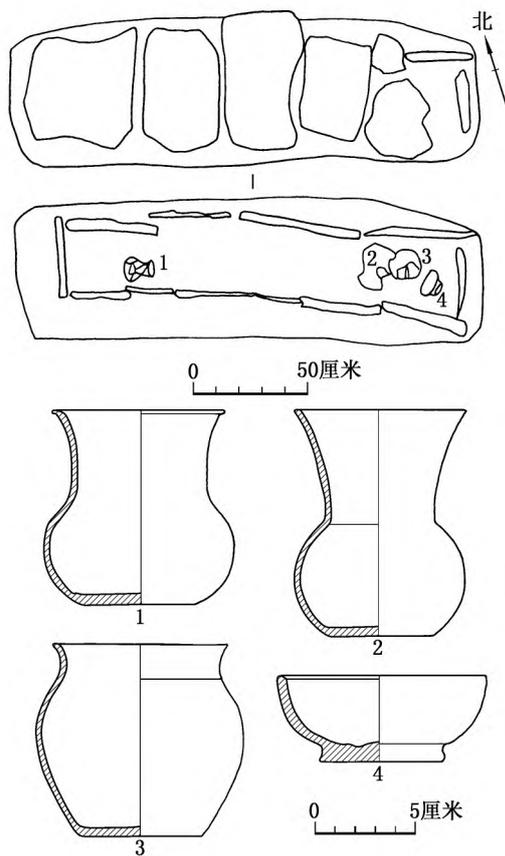
甲类墓: 有盖无底型石椁墓, 即用石板或石块构筑椁室四壁并覆盖顶部, 但椁底不铺石板或石块。根据木质葬具的有无, 并结合椁室的构筑方式, 以及所用石材等综, 将其分为三型。

A 型: 石板有盖无底土圻石椁墓, 即石椁内无木质葬具, 墓坑四壁立置薄石板构成椁壁, 顶部也用薄石板覆盖, 椁盖板为单层。灌云大伊山的六十一座石椁墓中有六十座(M28 除外) 属此型, 石板系用天然石片且多未经加工, 厚度在 8—15 厘米之间, 构筑时直接将石板竖向嵌入墓坑, 一般两侧壁各用二至三块, 两端各用一块, 顶部平铺数块石板作为椁盖。如大伊山 M15, 石椁长 1.9、宽 0.7 米, 椁内残存有骨渣, 头向 80 度; 随葬品五件, 其中玉璜一件置于尸骨颈部, 陶壶一件置于尸骨头侧, 其余三件陶器放在足旁(图二)。诸城石河头十五座石椁墓中有此型墓五座(86M1, M4、M5、M10、M12), 如石河头 86M1, 石椁明显头短宽、足端窄, 构筑规整, 长 1.92、宽 0.66—0.78、高 0.34 米, 石板厚 2—5 厘米, 单人仰身直肢葬, 头向 115 度, 随葬陶折腹壶一件(图三)。文登吻里店十五座石椁墓中, 此型墓仅一座(M5), 石椁长 1.84、宽 0.36—0.46、高 0.34—0.4 米, 方向 110 度, 四壁和椁盖均用经过加工的厚 2—6 厘米的花岗岩石板构筑; 随葬陶器四件, 其中壶一件置于椁室西端, 壶、罐、碗各一件置于椁室东端(图四)。

B 型: 石板有盖无底石椁木棺墓, 即石椁四壁和盖板均为薄石板, 椁盖板为单层, 石椁内有木棺作为葬具。日照苏家村的八座石椁墓中有六座属于此型, 分属于早、中、晚三期遗存。如苏家村 M39, 被 M7 和 M32 部分打破, 墓口长 2.41、宽 0.9、深 1.4 米, 石椁的四壁用未经加工的页岩石板围砌, 顶部用多块石板覆盖, 石椁内放置一木棺; 棺内人骨保存较差, 为单人仰身直

肢葬，头向东(图五)；随葬品有陶器九件，其中可复原者有鼎、鬻、罐、圈足盘、觥形杯各一件和折腹壶二件；属于苏家村早期阶段遗存(图六)。又如苏家村 M59，其结构与苏家村 M39 相同(图七)，墓口长 2.05—2.25、宽 0.75—0.85 米，深约 1.03 米；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 280 度；随葬品为一副猪下颌骨和四件陶器，其中陶罐、壶和高柄杯各一件可复原；属于苏家村中期阶段遗存(图八)。

C 型：石块有盖无底石椁木棺墓。石椁内有木棺作为葬具，但与 B 型最大的不同在于，椁室四壁不是用石板立置构筑而是用石块砌筑，并且椁顶用大石板覆盖并在其上堆积石块。乳山南黄庄发现十五座(M2—12、M14—16、M19，即发掘报告中的石椁墓)<sup>〔1〕</sup>，系先挖一个口大底小的圆角长方形土坑，再在四周用不规则的石块构筑椁室，一般砌筑一两层，里面砌成平面，顶部用大块石板覆盖，其上再堆积大小不同的石块，石椁内多有木质葬具痕迹。石椁一般长 2.7—3.4、宽 1.1—0.45、高 0.5 米左右，均为窄长形。如南黄庄 M2，是该墓地规模最大的一座，墓坑长 3.49、宽 2.28、深 0.4 米；石椁也是口大底小，四壁用不规则的石块砌筑，椁室口长 2.89、宽 1.15、高 0.4 米，椁内发现“井”字形木质葬具痕迹；椁室东端木棺外侧，筑有一高 17 厘米的土台，其上放置二件陶罐；人骨朽甚，推测头向东，方向 47 度；随葬品有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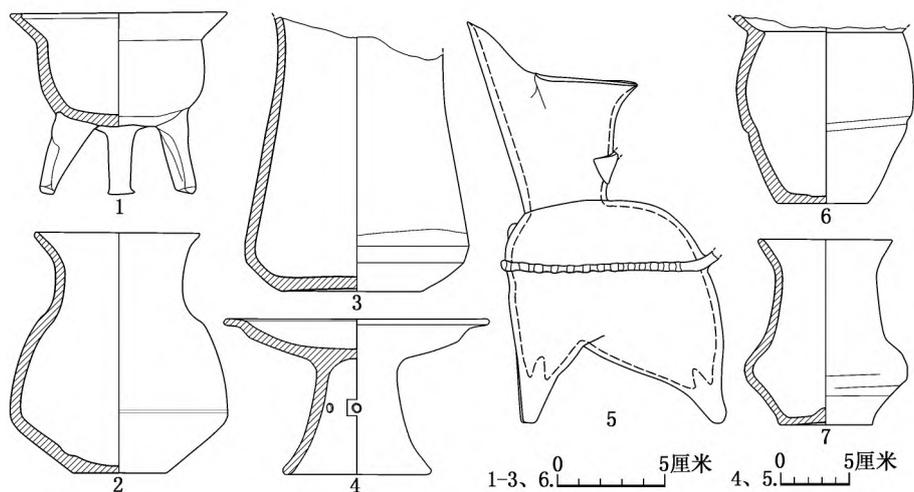


图四 阳里店 M5 平面图及出土陶器  
1、2. 壶 3. 罐 4. 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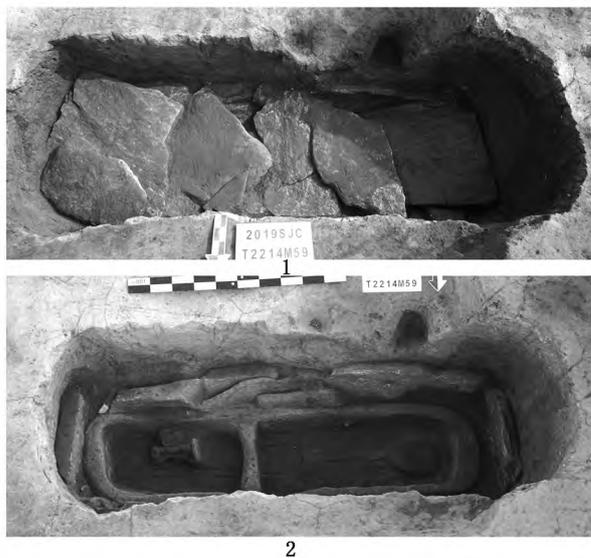
图五 苏家村 M39(上为北)

〔1〕 据发掘报告，M5 和 M15 两墓椁室的两端未用石块砌筑，可能是某种特殊原因所致，并且仅见二例，似乎不具有类型的意义，故暂归入甲类 C 型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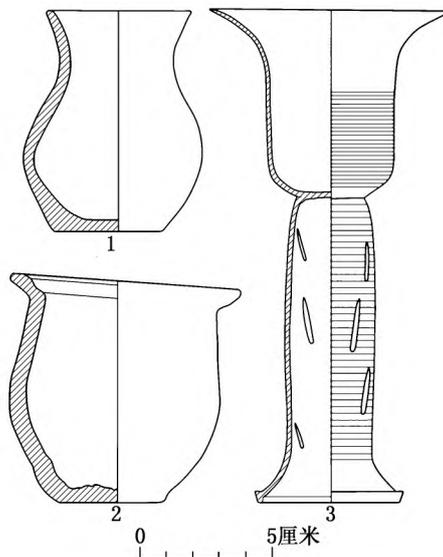
图六 苏家村 M39 出土陶器

1. 鼎 2, 7. 折腹壶 3. 觥形杯 4. 圈足盘 5. 鬲 6. 罐



图七 苏家村 M59(上为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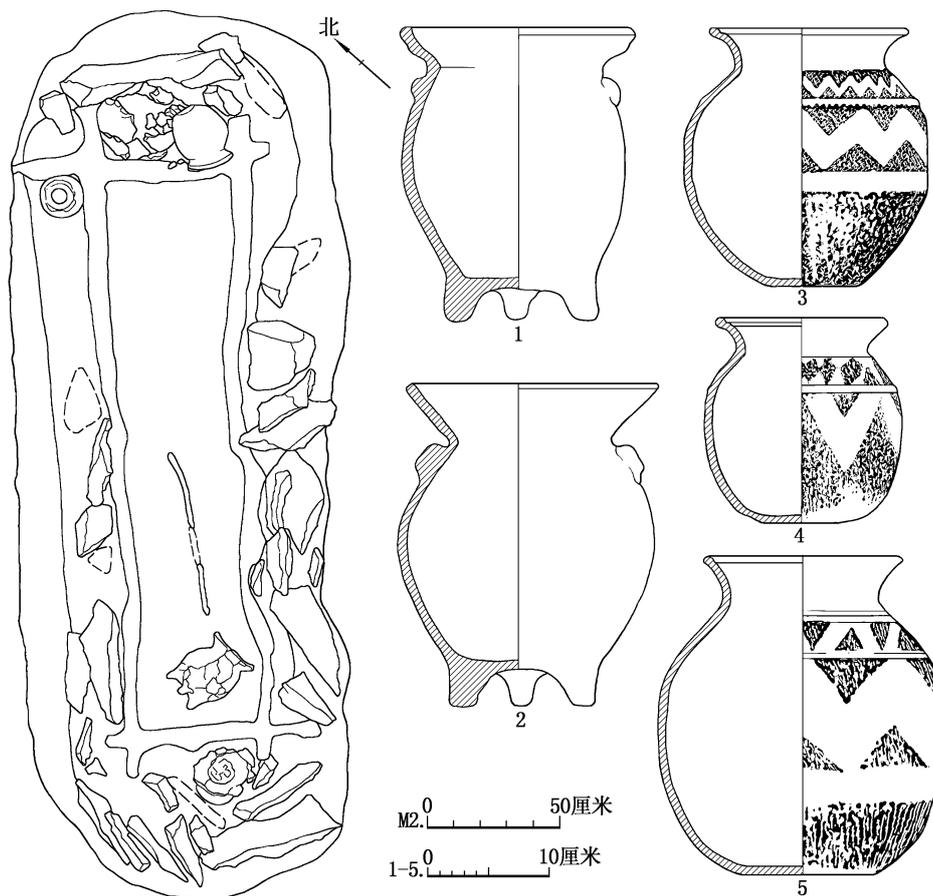
1. 石盖板 2. 石盖板揭取后



图八 苏家村 M59 出土陶器

1. 壶 2. 罐 3. 高柄杯

罐三件和陶鬲二件,均置放于东西两端的椁内棺外,而发现于棺内的一件陶鬲,本来是放置在棺外的(图九)。又如南黄庄 M5,墓底长 2.95、宽 1.1、深 0.5 米;椁室的南北两壁用不规则石块砌筑,但东西两端未用石头砌筑,长 2.95、宽 0.69、高 0.45 米,上部被后期破坏;椁室内有明显的木质葬具痕,人骨朽毁严重,推测头向东,方向 72 度;椁室东端的棺外用石板砌筑一高 17 厘米的石台,其上放置随葬品;随葬品计八件,分别是陶鼎一件、陶鬲三件和陶罐四件,分别放置在椁室的東西两端(图一〇)。此型墓在其他地点尚未见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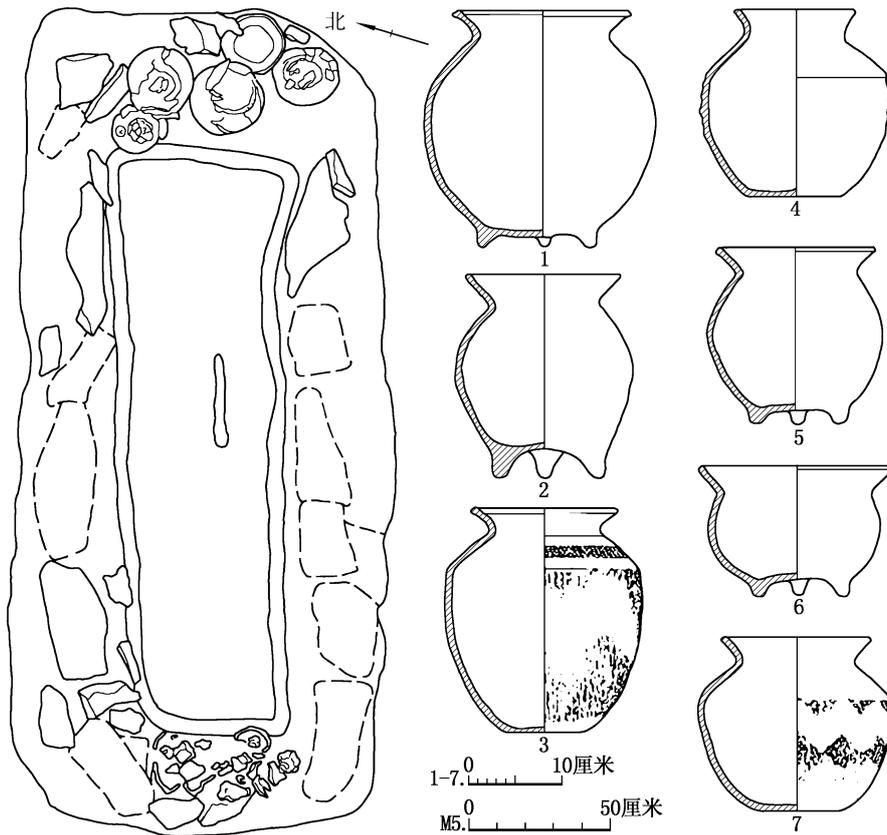


图九 南黄庄 M2 平面图及出土陶器  
1、2. 高 3—5. 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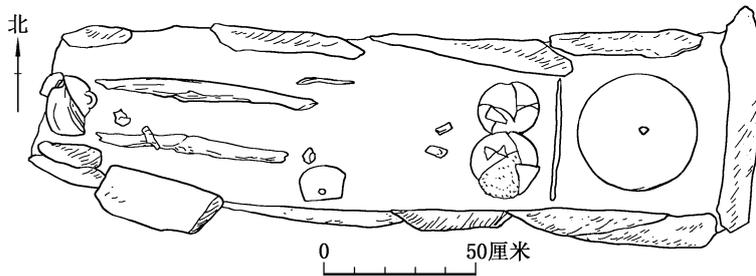
上述甲类三型墓之外,大伊山还发现一座结构和构筑方式如同 A 型但平面形制为“日”字形的墓葬(大伊山 M28),即椁室一端用石板分隔出一个犹如头厢的小椁室,形成一大一小的两个椁室。石椁通长 2.66、宽 0.8 米。主椁室内的被葬者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 68 度。主椁室头端的小椁室长 3.06、宽 0.78 米,内置一件直径 33 厘米的红陶钵,陶钵的底部正中有一直径 1.5 厘米的小孔,陶钵下面发现有头骨和零星的骨骼,经鉴定为一不足 5 岁的儿童(图一)。这似乎是一种形制特殊的“合葬墓”,仅此一例,附于此一并介绍。

乙类墓:有盖有底型石椁墓,即椁室的底部、四壁均用石板或石块构筑,椁顶用石板覆盖,椁内无木质葬具〔1〕。根据椁盖板结构、椁室构筑方式及所用石材等综合分析,将其分为三型。

〔1〕 根据各考古报告的记述,此类墓清理过程中均未发现木质葬具遗痕,因此这里暂且认定为此类石椁墓无木质葬具。但是否实际上存在着木质葬具的使用,只不过因完全朽毁而难以辨认,值得今后在发掘中注意。



图一〇 南黄庄 M5 平面图及出土陶器  
1、2、5. 高 3、4、7. 罐 6. 鼎



图一一 大伊山 M28 平面图

A 型: 石板单层盖有底土圻石椁墓, 即石椁四壁用石板立砌而成, 底部平铺石板, 盖板为单层, 石板大多经过加工。日照苏家村晚期阶段遗存发现二座, 如苏家村 M26, 墓口长 2.25、宽 0.95、深 0.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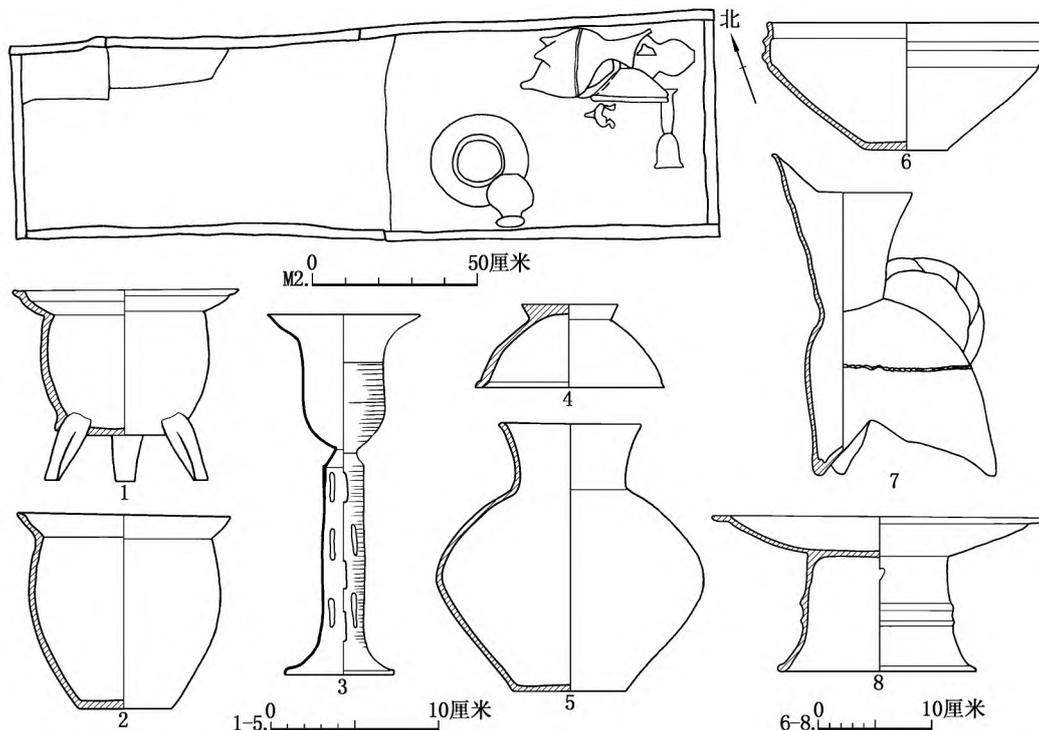
米; 盖板和四壁用略经加工的石板构筑, 底部石板平整; 人骨保存极差, 头向不明; 无随葬品(图一二)。诸城石河头发现二座(M2、M8), 如石河头 M2, 石椁长 2.14、宽 0.6—0.7、残高 0.3—0.4 米, 墓向 105 度; 椁室四壁和底部均用石板构筑, 椁壁左右两侧各立砌二块, 头端和足端各立置一块, 椁底平铺一块; 人骨已朽; 随葬品八件, 计有陶鼎、鬻、罐、圈足盘、壶、盆、高柄杯和器

盖各一件，均置于头端(图一三)。文登吻里店十五座石椁墓中，此型墓有十三座〔1〕，石板均经过精心加工。如吻里店 M10，石椁长 1.06、宽 0.36、高 0.26—0.32 米，头向 118 度；石椁四壁、底和盖板均用厚 3—5 厘米的花岗岩石板加工而成；随葬品三件，椁室东北隅放置陶罐一件，椁室西南角放置陶罐和陶碗各一件(图一四)。



图一二 苏家村 M26(上为北)

B 型：石板双层盖有底土圻石椁墓，即石椁四壁用石板立砌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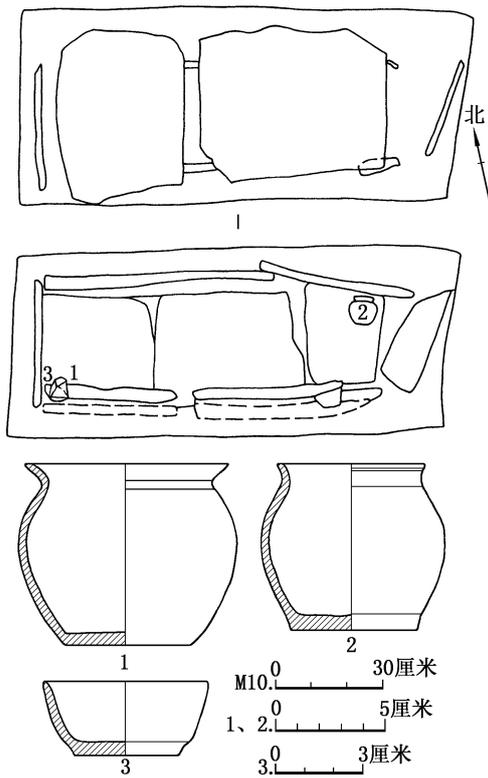


图一三 石河头 M2 平面图及出土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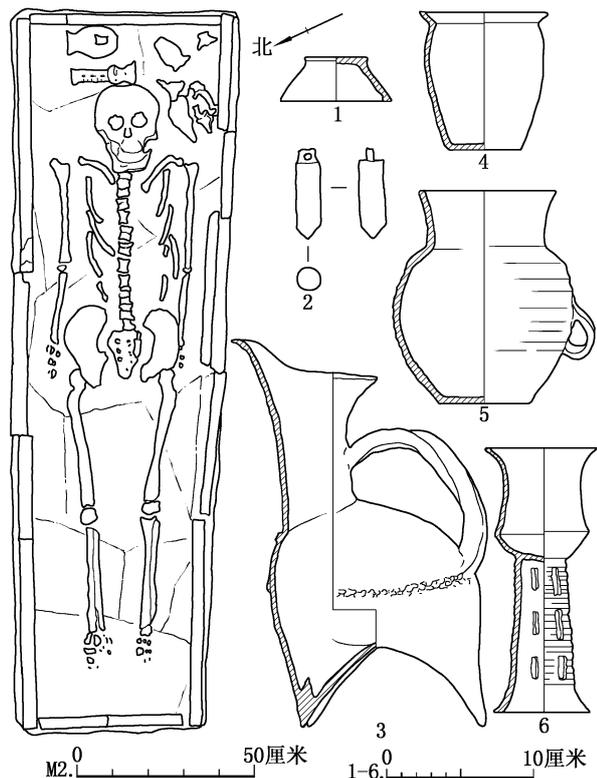
1. 鼎 2. 罐 3. 高柄杯 4. 器盖 5. 壶 6. 盆 7. 鬲 8. 圈足盘

底部平铺石板，盖板为双层，石板大多经过加工。诸城石河头十五座石椁墓中，此型墓有四座

〔1〕 吻里店 M15 无顶盖，实际上应为毁坏所致，因为其西侧、西南侧和东北侧的石板也已缺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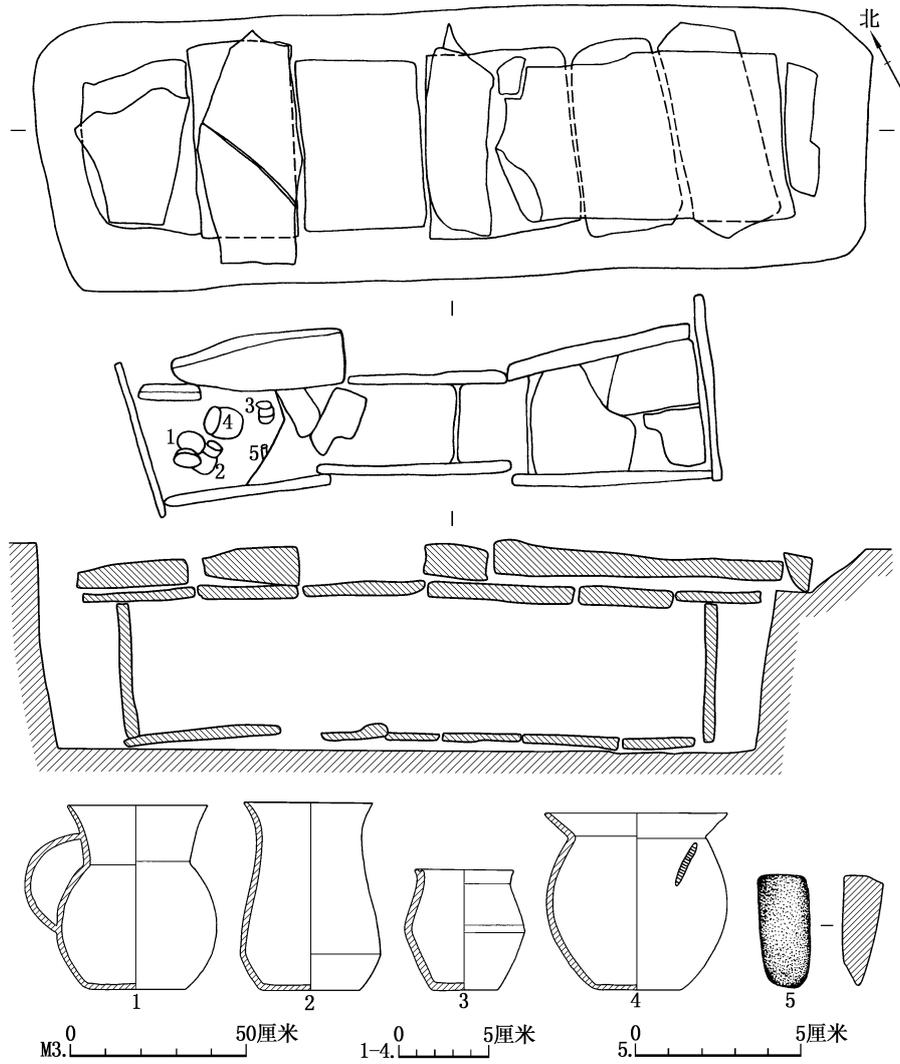
图一四 哟里店 M10 平面图及出土陶器  
1、2. 罐 3. 碗



图一五 石河头 86M2 平面图及出土遗物  
1. 陶器盖 2. 石坠 3. 陶鬻 4. 陶罐 5. 陶单把罐 6. 陶高柄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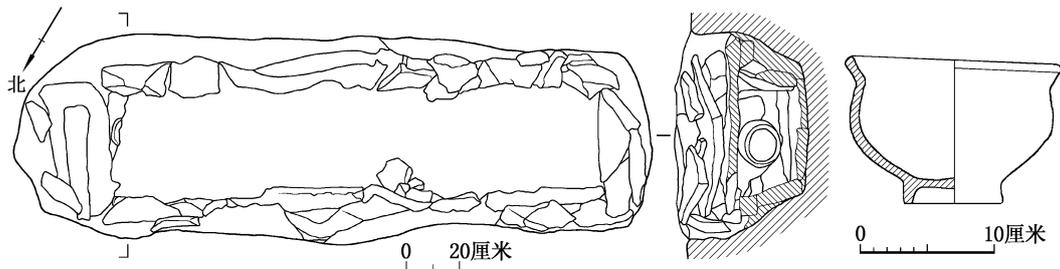
(86M2, M3, M6, M13)。如石河头 86M2, 石椁长 2.04、宽 0.52—0.6、高 0.4 米; 椁盖板为两层, 两层盖板之间有一层厚 10—12 厘米的黑胶泥; 单人仰身直肢葬, 头向 110 度; 随葬品六件, 其中石坠一件在腰部, 其余陶鬻、罐、单把罐、高柄杯和器盖各一件均在头部附近(图一五)。文登哟里店发现一座(M3), 石椁长 1.92、宽 0.29—0.43、高 0.38—0.4 米, 墓向 112 度; 椁底、四壁和椁盖使用的石板均用厚 2—14 厘米的花岗岩石板加工而成, 椁盖覆盖两层石板; 随葬陶罐二件和单把壶、觥形杯各一件以及石凿一件(图一六)。此型墓数量较少, 目前所知仅有上述二个地点发现的五座。

C 型: 石块有盖有底土圻石椁墓, 即石椁四壁和椁底均用石块砌筑, 椁顶用大石板覆盖后再在其上堆积石块。此型墓迄今只在乳山南黄庄发现五座 (M1、M5、M17、M18、M21, 即发掘报告中的石棺墓), 均属于南黄庄丙组墓, 即南黄庄石椁墓的晚期阶段。如南黄庄 M1, 墓坑为口大底小的不规则圆角长方形, 墓口长 2.43、宽 0.81、深 0.46 米; 椁室四壁及底部用不规整的石块砌筑, 口大底小, 口部长 2.23、宽 0.45、高 0.23 米; 顶部用较大的石板封盖, 盖板之上原有积石但已被毁坏; 人骨朽甚, 但可知头向为 59 度; 墓室东端底部用石块砌筑一个高 9 厘米的石台, 其上放置一件陶簋; 椁内中部即被葬者腰部出土铜镞



图一六 阳里店 M3 及出土遗物

1. 陶单把壶 2. 陶觥形杯 3、4. 陶罐 5. 石凿



图一七 南黄庄 M1 平面、剖视图及出土陶簋

一件(图一七)。又如南黄庄 M21, 是该墓地规模最小的一座, 其东端略遭毁坏, 但总体保存较好; 墓坑残长 0.96、宽 0.54、深 0.48 米, 方向 54 度; 椁室四壁及底部用不规整单层石块砌筑, 口大底小, 口部残长 0.67、宽 0.25、高 0.2 米, 顶部用石板封盖; 无随葬品, 椁内未发现人骨, 推测是一座儿童墓。

## (二) 石椁墓类型的演变

基于上述类型学分析并结合前述之空间分布及其年代学讨论可以看到, 苏鲁黄海沿岸地区石椁墓的各种类型之间(表一), 既有明显的地域性差异, 更有明显的时代性差异, 但细察之, 这种墓葬类型的不同, 更多的是其年代不同所致, 基本上反映出石椁墓类型结构的发展演变。

类型	地点	大伊山	东海峪	苏家村	石河头	吻里店	南黄庄	小计	备注
甲类	A 型	60			5	1		66	石板有盖无底土圻石椁墓
	B 型			6				6	石板有盖无底石椁木棺墓
	C 型						15	15	石块有盖无底石椁木棺墓
乙类	A 型			2	2	13		17	石板单层盖有底土圻石椁墓
	B 型				4	1		5	石板双层盖有底土圻石椁墓
	C 型						5	5	石块有盖有底土圻石椁墓
不明或其他	1	≥3		4		2	≥10	残或详情未知或形制特殊	
合计	61	≥3	8	15	15	22	≥124		

综观这一地区的石椁墓, 其流行年代分属于三个时期, 即以大伊山石椁墓为代表的早期阶段, 是北辛文化中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存, 约当公元前 4500—前 3500 年之间; 东海峪、苏家村、石河头和吻里店等为中期阶段, 主要是大汶口文化末期至海岱龙山文化早期遗存, 少数可晚至龙山文化中期前段, 约当公元前 2700—前 2400 年; 以南黄庄石椁墓为代表的晚期阶段, 是年代相当于西周中期前后的土著文化遗存, 约当公元前 9 世纪及其前后。基于这样的年代观并结合石椁墓的类型可以看到其总体的演变轨迹。

早期阶段, 流行甲类 A 型墓, 即石板有盖无底土圻石椁墓, 类型单一, 构筑石椁的石板是未经加工的天然石板, 并且未出现木质葬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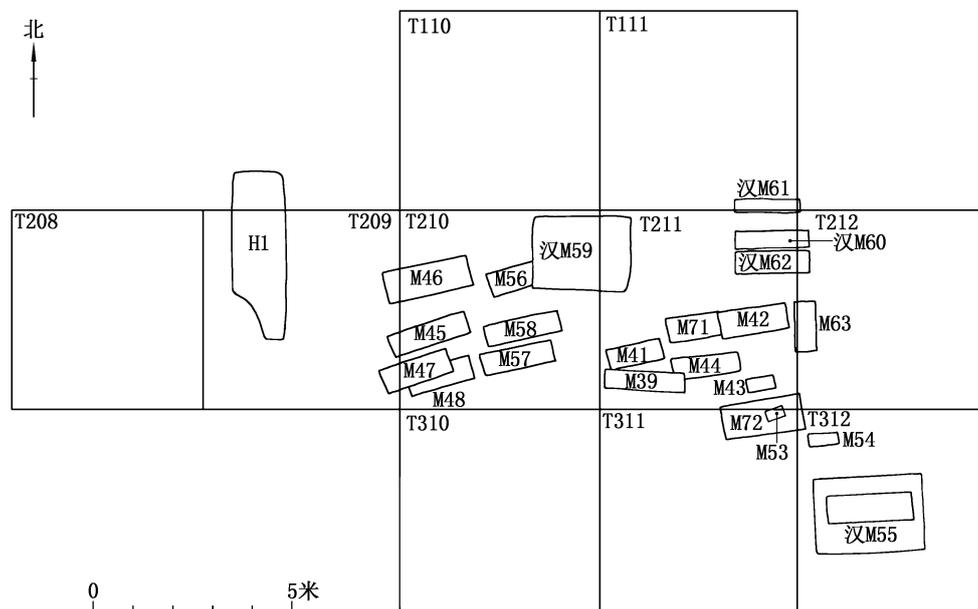
中期阶段, 墓葬类型趋于多样化, 甲类 A 型墓继续存在的同时, 甲类 B 型墓(石板有盖无底石椁木棺墓)、乙类 A 型墓(石板单层盖有底土圻石椁墓)和乙类 B 型墓(石板双层盖有底土圻石椁墓)等新的墓葬类型出现并流行。其变化主要表现在: 其一, 有底石椁墓的出现, 反映出石椁结构趋于完善; 其二, 木质葬具的出现, 见于苏家村的六座石板有盖无底石椁木棺墓, 其随葬品相对比较丰富, 成为石椁墓的被葬者社会身份地位差异或者贫富差别的一种直接反映; 其三, 构筑石椁的石材仍然是石板, 但大都经过人为加工, 有的甚至加工比较精细, 如吻里店石椁

墓都是用加工细致、较为规整的花岗岩薄石板构筑〔1〕，反映出石椁构筑技术的提高和观念上更为讲究；其四，有底石椁的盖板出现了单层和双层之别，也应是墓葬规格高低的一种表现。总体上看，尽管中期阶段与早期阶段在年代上存在着约八百年的空白期，但就石椁墓的类型来说，前者与后者一脉相承是清楚的。

晚期阶段，墓葬结构和构筑方式发生明显变化，即构筑石椁的石材由石板改为石块，椁顶改用大石板覆盖并在椁盖板之上再堆积石块，甲类 C 型墓（石块有盖无底石椁木棺墓）和乙类 C 型墓（石块有盖有底土圻石椁墓）随之出现并流行开来；椁底的一端或一隅常常用石块砌筑出石台并在其上放置随葬品，有的椁壁用两层石块砌成，无底石椁墓使用木质葬具而有底石椁墓则不使用。尽管甲类 C 型墓和乙类 C 型墓目前仅发现于乳山南黄庄一地，其墓葬类型与前两个阶段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甚至在年代上晚期阶段与中期阶段之间存在着约一千五百年的空白期，但前者是从后者发展演变而成的脉络基本上也是清楚的。

### （三）石椁墓的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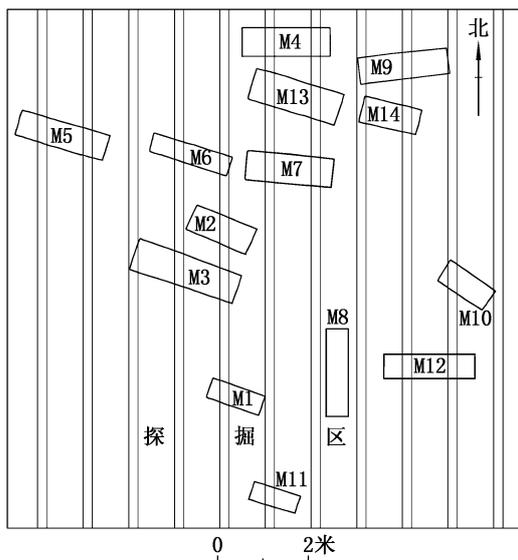
就苏鲁黄海沿岸地区石椁墓的墓地形态来看，主要有两种类型。



图一八 大伊山石椁墓地(第二次发掘区东北隅)墓葬分布图

一种类型是单纯的石椁墓墓地，一般分布在与居住区有一定距离的山顶或山坡上，总体上墓葬排列有序，并且常见分墓区、分组排列的现象。譬如，大伊山石椁墓地第一次发掘的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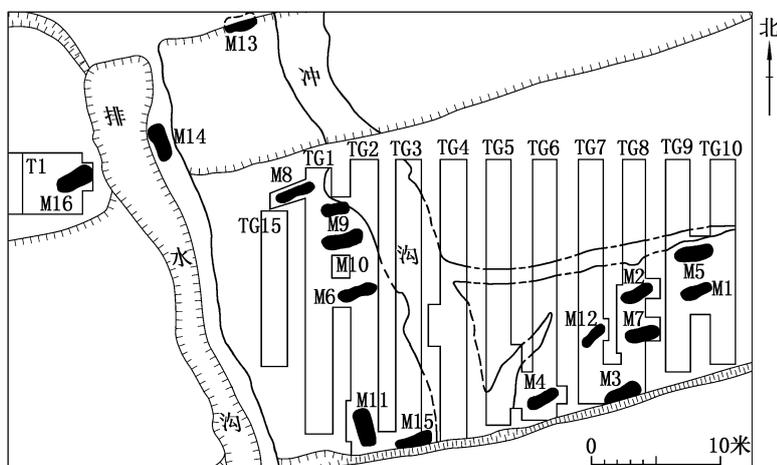
〔1〕 发掘简报称，吻里店构筑石椁墓的石板，“略呈长方形，花岗岩质，采自附近山体，都经过精心加工，一般长 0.4—0.6、宽 0.26—0.45、厚 0.03—0.04 米；最长的石板长 1、宽 0.6、厚 0.05 米”。



图一九 吻里店石椁墓地墓葬分布图

七座,其中二十座位于发掘区西南角(墓地西北部)的 T1,排列有序,分为八列,少则一座,多则一列四座;第二次发掘的二十四座中位于发掘区东北隅的十七座,分为六列作同向排列,分布密集,各墓之间有一定距离(图一八);第二次在发掘区西南角清理的六座(M64—M69)与第一次发掘的二十座(M1—M20)构成同一墓区。被葬者大多为成年,但也包括个别的儿童,如 M41 和 M45 等,说明儿童与成年人同样采用石椁墓的方式埋葬。第二次发掘中,发现叠压打破关系四组,说明墓地使用的时间较长。墓地附近尚未发现同时期的居住遗址。可见,大伊山石椁墓地在布局结构上由若干墓区组成,一个墓区内又

分为若干墓组并有序排列,头向均在 60—90 度之间,说明事先有所规划,或墓上有地面标识,显然属于氏族公共墓地。又如吻里店石椁墓地,位于板桥河北岸的小山包上,在 1000 平方米的探掘范围内,发现石椁墓十四座;其中除一座(M8)为南北向外,其余十三座均为东西向,头向在 85—120 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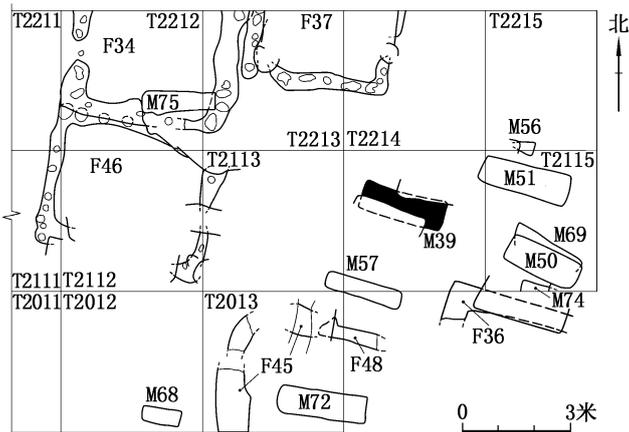


图二〇 南黄庄石椁墓地墓葬分布图

间;墓葬大致可分为四组,排列大多比较整齐,各墓之间无叠压打破现象;墓地附近未发现居址遗址(图一九)。再如,石河头墓地的发掘区为南北长 140、东西宽 40 米的长条形,在此范围内发掘的十四座墓,总体布局上大致可分为北、中、南三个墓区,其中北区三座、中区七座、南区四座;头向均为东南,大都在 97—115 度之间,分布有序,大多是二座为一组,南北排列,各墓之间无叠压打破现象;应属于一处由墓组、墓区构成的氏族公共墓地。南黄庄墓地(图二〇)也属于此类墓地。

另一种类型是石椁墓与非石椁墓(包括无葬具的竖穴土坑墓、竖穴土坑木椁墓和竖穴土坑

木棺墓)相间分布。这种类型的墓地分别发现于东海峪遗址和苏家村遗址,因前者详情未知〔1〕,这里以后者为例。苏家村遗址的发掘区位于遗址东南部环壕内侧的坡地上,发掘区的北部是呈东北—西南走向排列的房址,墓葬大多集中分布在发掘区东部的房址外侧(即东南侧),另有个别墓葬零散分布于房址之间,两种墓葬的头向均为东南向(东南方向为大海),大致表现出居住址在内、其外围



图二一 苏家村遗址(发掘区东部局部)早期阶段遗迹分布图

设墓地的聚落布局。墓葬结构及年代明确的六十九座墓中,包含石椁墓八座,分属于苏家村遗址的早期、中期和晚期阶段。早期阶段十二座墓中有石椁墓四座,与非石椁墓相间分布,如石椁墓 M39 周围分布有 M51、M50 和 M57 等非石椁墓(图二一);中期阶段十七座墓葬中有一座为石椁墓(M59),其附近发现有 M78、M32 和 M31 等非石椁墓;晚期阶段四十座墓中有石椁墓三座,同样是散落分布在非石椁墓之间,如石椁墓 M26 西南侧依次排列有非石椁墓 M44、石椁墓 M3 和非石椁墓 M64 等〔2〕。很显然,这种以非石椁墓为主要墓葬类型的墓地中,无论是规模、头向还是随葬品,石椁墓与非石椁墓几乎相同并且相互排列在一起,反映出两种墓葬类型之间密切的内在联系,甚至可以说,石椁墓是被作为非石椁墓的一员而平等对待的。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其动因值得深入探讨。

### 三 石椁墓的发生与扩散及相关问题

上述石椁墓的空间分布、年代关系、墓葬类型及其演变和墓地形态的分析,为进一步探讨苏鲁黄海沿岸地区石椁墓的发生和扩散及相关问题奠定了基础。

关于这一地区石椁墓的起源,根据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或可初步认为,苏鲁黄海沿岸地区的石椁墓发生于距今约 6500 年前黄海西岸的今江苏东北部的灌云县一带,即淮河下游的沿海地带。因为,在整个苏鲁黄海沿岸地区以灌云大伊山石椁墓的年代为最早,并且其形制结构最为原始;即使长江入海口以南的东海沿岸地区,以及海岱文化区的其他地区,也无年代更早的

〔1〕 根据发掘简报正文和图四可知,东海峪不同类型墓葬相间分布及墓葬与居址空间关系与苏家村遗址基本相同。

〔2〕 关于上述苏家村石椁墓周围的墓葬类型,承发掘领队宋艳波同志告知,谨此致谢。

石椁墓乃至类似的石构墓葬的发现〔1〕。如果这一判断无误,那么苏鲁黄海沿岸地区乃至整个海岱文化区的石椁墓,应当是以大伊山为起点向外扩散而出现的。

关于石椁墓是否从江苏东北部沿海地区向南扩散的问题,有学者曾根据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乃至辽西地区史前至商周时期石构墓葬的发现,认为“太湖地区在商周时期突然出现的石室建筑,忽如不速之客,应该是东部沿海地区夷人文化南迁的结果”〔2〕,言下之意是太湖地区商周时期的石构建筑来源于黄海沿岸地区。诚然,“在太湖和杭州湾地区,一些土墩墓中还有石室,即用石块筑成墓室和墓道,墓顶盖石,墓底铺石片或砂砾土”,“时代大致从商代后期到战国”〔3〕。但这种土墩石室墓与黄海沿岸地区的土圻石椁墓之间,无论年代还是墓葬结构都看不到内在联系。至于浙江东南部东海沿岸地带的瑞安境内的岱石山等三个地点发现的支石墓〔4〕,其年代大致为西周时期,约当公元前 10 世纪前后,与苏鲁黄海沿岸地区的土圻石椁墓之间同样看不到任何内在的联系。因此,苏鲁黄海沿岸地区的石椁墓迄今尚无由北向南扩散的迹象,太湖和杭州湾地区的土墩石室以及浙东南沿海地带的支石墓似乎另有源头。

苏鲁黄海沿岸地区的石椁墓向内地的扩散曾一度出现。1974—1978 年间泰安大汶口遗址的第二和第三次发掘,发掘清理北辛文化晚期的墓葬十座,其中二座为石椁墓(M1010、M1011),两墓“在长方形墓坑内壁用若干页岩石板围成长方形石框,上盖石板成为有顶无底的石棺式葬具”,平面形制均为长宽之比大于 2:1 的窄长型,葬式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其中 M1010 的被葬者为一儿童,头向 85 度,盆骨上放置一件红顶陶钵;M1011 的被葬者为一中年男性,头向 100 度,随葬三件牙镞。“大汶口遗址北辛文化的年代为距今 6470—6100 年”,“为北辛文化晚期阶段的文化遗存”;同时大汶口遗址北辛文化晚期遗存又可细分为早、晚两期,其“早期年代约在距今 6470—6210 年之间,晚期在距今 6210—6100 年的百余年左右”〔5〕;而二座石椁墓均为其晚期遗存,即在北辛文化中属于最晚的遗存〔6〕。大汶口遗址的石椁墓无论其墓葬结构、平面形制还是葬式及头向,均与大伊山的甲类 A 型石椁墓相同,并且二者同属于北辛文化,只不过前者属于北辛类型,后者属于大伊山类型。值得注意的是,石椁墓在大伊山遗址属于流行的墓葬类型,并被视为北辛文化大伊山类型的“具有本地区特色的因素”,而在大汶口遗址则属于一种罕见的特殊类型的墓葬,况且大伊山石椁墓出现于距今 6500 年前后并延续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185—190、451—485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  
〔2〕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203 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  
〔3〕 施劲松:《商周两汉的土墩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汉土墩墓考古发现与研究——秦汉土墩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3 年。  
〔4〕 安志敏:《浙江瑞安、东阳支石墓的调查》,《考古》1995 年第 7 期。  
〔5〕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32—69 页,科学出版社,1997 年。按:据该报告文字记述和第 15 页图九可知,石椁墓 M1010 和 M1011 发现于大汶口遗址 74 南区 3B 层下,两墓东西相距约 25 米;与之同属于 3B 层下的同期墓葬有竖穴土坑墓 M1003(成年男性墓,随葬骨镞二件)和 M1017(一成年女性和一儿童的合葬墓,未发现随葬品);M1003 位于 M1011 西南约 10 米处,M1017 位于 M1010 西南约 10 米处。  
〔6〕 栾丰实:《北辛文化研究》,氏著《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年。

至距今 5500 年前后,而大汶口石椁墓的年代在距今 6200 年—6100 年间。综合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大汶口遗址北辛文化晚期的石椁墓是大伊山石椁墓向西北方向扩散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苏鲁黄海沿岸石椁墓西向内陆地区的扩散仅限于此,因为海岱文化区中心地带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中,迄今未见石椁墓的踪影。

苏鲁黄海沿岸地区石椁墓的扩散,主要是沿黄海西岸由南向北展开的。前文的分析表明,石椁墓于公元前 4500 年前后发生于苏东北大伊山一带,并在当地延续至公元前 3500 年前后;公元前 2700 左右向北扩散到黄海西岸的日照东海峪、日照苏家村、诸城石河头和胶东半岛东端的文登吻里店等地,并存续至公元前 2400 年前后;公元前 9 世纪前后扩散至胶东半岛东南隅的乳山南黄庄一带,成为西周中期前后当地土著文化流行的埋葬方式。诚然,石椁墓从苏东北沿海扩散至鲁东黄海沿岸地带的日照、诸城以及胶东半岛文登一带之间存在着八百年左右的年代缺环,文登吻里店石椁墓与乳山南黄庄石椁墓之间更是存在着约一千五百年的年代缺环,并且对于这两个年代缺环目前尚无法做出实证性解释,但石椁墓沿黄海西岸由南向北一路北上扩散的总体轨迹是清楚的。

如果上述分析及其认识可以成立,那么应当如何解释石椁墓的这种扩散?是文化因素的渐次传播?还是人群迁徙的结果?在笔者看来,应当是人群迁徙的结果。试做如下分析。

人群的迁徙是人类发展史上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于是便产生了移民<sup>[1]</sup>。移民从迁出地到达迁入地之后,在物质生产和以饮食起居为代表的物质生活方面会迅速地融入迁入地的物质文化之中,但在精神生活方面则会长期保留本族群特有的一些信仰、观念和习俗等精神文化,而生死观支配下形成的丧葬观念、丧葬方式和丧葬习俗又是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族群认同的一个重要方面。“丧葬观念和行有一个鲜明的文化特征,即具有强烈的族群标识性和传承性,也就是说,一个人类集团的丧葬观念及行为一旦形成,往往作为本集团的标识之一成为其固有的一种丧葬习俗,并且长期得以传承”<sup>[2]</sup>。苏鲁黄海沿岸地区的石椁墓,正是伴随着人群的迁徙而扩散的。鉴于苏鲁黄海沿岸地区史前时期的石椁墓分属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但这种墓葬又明显有别于这些文化共同体流行的竖穴土坑墓<sup>[3]</sup>,表明石椁墓的被葬者是这些文化共同体中具有某种独立意识和丧葬观念的特殊群体,为便于表述,这里暂且以“石椁墓人群”称之。

[1] 葛剑雄认为:“一般说来,移民是指迁离了原来的居住地而在其他地方定居或居住了较长时间的人口”,进而根据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特点给出的“移民的定义是: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导论》,1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2] 白云翔:《公元前一千纪后半环黄海地区的瓮棺葬及其历史文化阐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黄骅市博物馆《瓮棺葬与古代东亚文化交流研究——瓮棺葬与古代东亚文化交流(中国·黄骅)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8年。

[3] 据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综合性研究,大汶口文化“发现各类墓葬 2200 多座”,海岱龙山文化“目前为止共发掘墓葬 500 多座”,除本文所论之四个地点的四十余座石椁墓外,余均为竖穴土坑墓或使用木质葬具的竖穴土坑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305、306、609—6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从石椁墓的发生期即早期阶段来看,石椁墓出现于北辛文化中期的大伊山类型,但它既不是北辛文化的一种普遍的墓葬类型,也不是大伊山类型通行的墓葬类型,而是大伊山居民——这里暂且称之为“大伊山部落”〔1〕特有的一种墓葬形式。因为在大伊山邻近地区并且同属于北辛文化大伊山类型的连云港二涧村〔2〕和大村〔3〕、沭阳万北〔4〕等遗址均未发现石椁墓。距今 6210 年前后的北辛文化晚期,大伊山部落居民——石椁墓人群的一部分由于某种原因移民到泰安大汶口一带,虽然在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上融入到当地的文化当中,但死后仍采用了本部落特有的石椁墓这种埋葬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大伊山以及苏东北地区大汶口文化早期以降的文化遗存中,石椁墓再无发现,表明石椁墓传统在苏东北地区没有流传延续,或许是大伊山部落的人群已经全部迁至他地的缘故。

从石椁墓流行的中期阶段来看,南起日照的东海峪和苏家村、中间地带的诸城石河头、北到胶东半岛东端沿海地带的文登吻里店,约当公元前 2700 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末期,石椁墓在上述各地几乎同时出现,流行时间约一百至三百年不等。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在海岱文化区各地、各类型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中,流行的墓葬形式是非石椁墓,无论是无葬具的竖穴土坑墓还是竖穴土圻木棺墓和竖穴土圻木椁墓,即使东部沿海地带也是如此〔5〕,而石椁墓是仅见于东部沿海地带少数遗址的一种特殊的墓葬类型,因此它不是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主体文化因素,而是一种有别于当地居民的外来人群——移民的文化遗存。在日照东海峪遗址,“这里三期墓葬的葬式和葬俗上相同,如人架都是仰身直肢葬,头向西北,器物基本组合和墓葬结构上都有长方形土圻或长方形土圻石椁等都比较一致”〔6〕。就苏家村遗址来看,石椁墓与非石

〔1〕 当时大伊山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目前尚不甚清楚,但石椁墓流行反映出大伊山居民是在丧葬习俗上有别于同是北辛文化大伊山类型其他聚落的相对独立的人群,从其规模上看还达不到部族的程度,故这里暂且以部落称之。

〔2〕 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连云港市二涧村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62 年第 3 期。按:该遗址 1960 年春的发掘中,发掘清理“青莲岗文化”墓葬七座,均为竖穴土坑墓。

〔3〕 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新海连市大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勘察记》,《考古》1961 年第 6 期。

〔4〕 谷建祥、尹增淮:《江苏沭阳万北遗址试掘的主要收获》,《东南文化》1988 年第 2 期;南京博物院:《江苏沭阳万北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92 年第 12 期。按:该遗址 1987 年冬的试掘未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1987 至 1988 年的发掘,发掘清理“青莲岗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墓葬七座,其中四座为竖穴土坑、另三座墓圻不清。

〔5〕 鲁东沿海及胶东地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墓葬多有发现,除本文所论的日照东海峪诸遗址之外,其余遗址的墓葬均为土圻竖穴墓,如临沂大范庄二十六座(临沂文物组:《山东临沂大范庄新石器时代墓葬的发掘》,《考古》1975 年第 1 期)、日照两城镇一百余座(中美联合考古队:《两城镇:1998—2001 年发掘报告》,1602 页,文物出版社,2016 年;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 2018 年发掘简报》,《考古》2021 年第 10 期)、日照尧王城一百三十九座以上(临沂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日照县图书馆:《日照尧王城龙山文化遗址试掘简报》,《史前研究》1985 年第 4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照市文物局:《山东日照市尧王城遗址 2012 年的调查与发掘》,《考古》2015 年第 9 期;诸城呈子八十七座(昌潍地区文物管理组、诸城县博物馆:《山东诸城呈子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0 年第 3 期)、胶县三里河九十八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县三里河》,文物出版社,1988 年)、即墨市北阡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五十座(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即墨市博物馆:《山东即墨市北阡遗址 2007 年发掘简报》,《考古》2011 年第 11 期)等。

〔6〕 山东省博物馆、日照县文化馆东海峪发掘小组:《一九七五年东海峪遗址的发掘》,《考古》1976 年第 6 期。

椁墓相间分布,两者的葬式和头向一致,随葬品的种类及其组合和多寡也没有明显的不同,说明石椁墓和非石椁墓的被葬者之间的差异主要不是身份、地位或贫富的差别,而是人群的不同。据此或可推论,大汶口文化末期石椁墓人群在由南而北的迁徙过程中,途经日照沿海地带时少数甚至是个别人滞留在了东海峪和苏家村等地,与当地居民杂居共处并融入到当地社会之中繁衍生息,但死后仍然采用本部族传统的石椁墓葬方式,以昭示他们是大伊山部落的子孙。

诸城石河头和文登吻里店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这两处墓地都是单纯的石椁墓地,说明其被葬者族属相同,但其葬式、头向和随葬品尤其是陶器的种类、组合及形制所表现的物质文化面貌与周邻同类文化遗存别无二致,只不过墓葬类型有异。据此或可推论,大汶口文化末期石椁墓人群在由南而北的迁徙过程中,一部分人留在了诸城一带,一部分人继续北迁到了文登一带,他们分别在石河头和吻里店聚族而居、繁衍生息,形成了主要由大伊山部落后裔组成的移民聚落。它们尽管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某些方面完全与当地的文化融为一体,但将本部族传统的石椁墓葬习俗长期地保留了下来。

在石椁墓流行的晚期阶段,较之前两个阶段出现了明显的不同。一方面,墓葬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甲、乙两类的 A 型和 B 型墓均演化为 C 型墓。另一方面,以陶器的质地、器形、纹饰、器类及其组合等所反映的物质文化面貌独特,既具有珍珠门文化晚期特征又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还使用周文化的铜镞。尽管这一时期的石椁墓目前仅发现于南黄庄附近及其西南相邻的南斜山村的村南、村东和村北一带,但“与南黄庄文化相同的材料,目前在半岛中部以西地区尚未发现,仅发现于半岛的东南部一带。其中以乳山县发现的最多,有寨山遗址、合子遗址、南黄庄遗址和墓群、俞介庄墓群、大浩口墓群、海幢墓群等十几处。牟平的东南部及半岛最东端的荣城县,也发现了南黄庄文化的线索”〔1〕。很显然,以南黄庄石椁墓及出土陶器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是具有鲜明自身特色、主要分布于胶东半岛东南隅沿海地带的一种文化遗存。换言之,是西周中期前后胶东半岛东南隅的一种土著文化。据此或可推论,公元前 900 年前后,石椁墓人群的一部分迁徙到胶东半岛东南隅的今乳山一带定居下来繁衍生息,并以南黄庄、南斜山村一带为中心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聚落群和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它们尽管与珍珠门文化关系密切,甚至被视为珍珠门文化的最晚的一期遗存,但在埋葬方式上仍保留了本部族固有的石椁墓传统。

如果上述推论可以成立,那么,苏鲁黄海沿岸地区石椁墓由南向北的扩散大致勾画出了石椁墓人群自苏东北沿海地带出发一路北上直至胶东半岛东端的迁徙图景。至于他们北向迁徙的动因,或许是出于某种自然环境的、社会压力的乃至精神信仰的原因〔2〕,但尚难以做出实证性说明。就他们迁徙的具体路线来说,究竟是沿海的陆路还是近海的水路,尚无可资说明的实

〔1〕 王锡平:《胶东半岛夏商周时期的夷人文化》,《北方文物》1987年第2期。

〔2〕 葛剑雄认为:“一般情况下,在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社会动乱或战争的情况下,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长距离的和集中进行的移民”(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导论》,4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证性材料,如果考虑到石椁墓的发现地点均位于滨海地区,尤其是东海峪、苏家村和南黄庄等地点更是地处近海、面海的海边地带,或可认为,他们的迁移路线主要是近海水路,抑或是近海水路和沿海陆路兼有之。

关于石椁墓人群的族属,学术界尚无专门的讨论。严文明曾经指出:日照东海峪、诸城石河头等地的石椁墓,“是一部分夷人的传统风俗”〔1〕;乳山南黄庄石椁墓群,“推测这里是被齐人排挤到山隅海角、又受到齐文化一定影响的东夷人的墓地”〔2〕;南黄庄石椁墓之类的遗存,“是被周人排挤到穷乡僻壤的东夷的最后遗迹”,“大概就是齐东野人的踪迹”〔3〕。南黄庄墓地的发掘者根据其地理位置并结合《后汉书·东夷列传》、《尚书·禹贡》等记载,进一步推论“南黄庄墓地的族属很可能就是嵎夷当中的一支”〔4〕。刘延常等也认为其是嵎夷的文化遗存〔5〕。据《后汉书·东夷列传》:“《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夷有九种,曰吠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据考证,今山东及邻近地区属于东夷集团所居的地域〔6〕。因此,学术界一般认为,海岱文化区的史前文化以及夏商周时期的土著文化,属于夷人的遗存,或曰东夷人的遗存〔7〕。同时也有学者认为,苏东北地区大伊山墓地、二涧村遗址等遗存可能与淮夷和徐夷先民的文化有关〔8〕。值得注意的是,大伊山墓地除了石椁墓这种墓葬形式有别于其他同类文化遗存之外,墓葬的头向、仰身直肢葬的葬式、随葬品及其组合、部分被葬者头部覆盖红陶钵等丧葬习俗均与其他同时期同类遗址相同〔9〕,而墓葬的头向和葬式等又同样具有重要的族属标识意义〔10〕。因此,大伊山部落尽管采

〔1〕 严文明:《胶东原始文化初论》,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烟台市博物馆《胶东考古研究文集》,齐鲁书社,2004年。

〔2〕 严文明:《胶东考古记》,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烟台市博物馆《胶东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

〔3〕 严文明:《东夷文化的探索》,《文物》1989年第6期。

〔4〕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乳山南黄庄石椁墓》,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烟台市博物馆《胶东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

〔5〕 刘延常:《珍珠门文化初探》,《华夏考古》2001年第4期。按:该文认为,南黄庄石椁墓属于珍珠门文化珍珠门类型,而“珍珠门类型遗存应是嵎夷创造的”。也有历史学者认为,从大汶口文化至岳石文化时期,“活动于(胶东)半岛东部的为嵎夷部族,东部的古文化遗存为嵎夷文化”(张寒梅、丛颌滋:《史前胶东居民族属考》,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烟台市博物馆《胶东考古研究文集》,齐鲁书社,2004年)。

〔6〕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56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7〕 严文明认为:“山东的史前文化,至少从新石器时代起,即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的整个时期,都应属于东夷远古文化的系统”(严文明:《东夷文化的探索》,《文物》1989年第6期)。栾丰实认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创造者属于同一族系,即古代东方的夷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只不过是东夷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阶段而已”(栾丰实:《大汶口文化的分期和类型》,氏著《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

〔8〕 纪仲庆、车广锦:《苏北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诸文化的再认识》,《纪仲庆文集·考古卷》,文物出版社,2021年。按:该文将大伊山墓地等视作青莲岗文化“大伊山类型”的典型遗址,将二涧村遗址和大村遗址等归属为青莲岗文化“北辛类型”,认为“大伊山类型可能就是代表淮夷先民的文化,北辛类型则可能是代表东夷另一支族先民的文化,或者是徐夷先民的文化”。

〔9〕 1960年连云港市二涧村遗址第二次发掘中,清理“青莲岗文化”墓葬七座,均为竖穴土圜墓,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东,随葬品较少,多数墓葬有用红陶钵覆盖头部的习俗(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连云港市二涧村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62年第3期),这些都与大伊山石椁墓地相同。

〔10〕 栾丰实:《墓葬头向反映的文化遗产——海岱地区史前埋葬习俗之一》,《东方考古》第18集,科学出版社,2021年。

用了独具特色的石椁墓,但它与北辛文化大伊山类型的其他遗址一样,同属于东夷人的文化遗存,至于是否与淮夷或徐夷有关,尚难以论定。夷或东夷作为夏商周时期中原王朝对其东方非华夏族群的泛称,种姓部落繁多,夷人系统内部有诸多不同的支系〔1〕。因此,苏鲁黄海沿岸地区从大伊山遗址的北辛文化到鲁东沿海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直至以乳山南黄庄为代表的西周时期胶东半岛东端的土著文化的石椁墓人群,无疑是东夷人这个大族群中诸多支系的一支,可能不过是一个非常小的支系而已。

## 四 余 论

石椁墓是石构墓葬的类型之一,而用石板、石块或砾石构筑墓室或构筑棺椁葬具的石构墓葬,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地。在我国,从西南地区的云贵高原、川西高原、青藏高原到西北的新疆地区、北方草原地带直至东北地区,古代石构墓葬在我国广阔的边缘地带有广泛分布,并且年代跨度从史前时期一直到明清时期,而辽东半岛就是石构墓葬集中分布的地区之一,并且类型多样。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隔渤海海峡相望,并且两地间古代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本文讨论苏鲁黄海沿岸地区的石椁墓就不能不涉及两地之间石构墓葬的关系问题。以往有学者认为,山东半岛的石椁墓“可能是受到辽东地区积石冢传统的影响”〔2〕,但从本文的研究来看,可能未必如此。

就辽东半岛来说,石构墓葬类型多样,包括石棺墓、石椁墓、大石盖墓、积石墓(积石冢)、石室墓、支石墓(石棚)等〔3〕,并且年代跨度长、广为流行。关于其发生及演变,学术界尚无系统研究。迄今的考古发现表明,辽东半岛最早出现的石构墓葬是以旅顺老铁山及将军山积石墓〔4〕、四平山积石墓〔5〕、文家屯东山积石墓〔6〕等为代表的积石墓〔7〕,但学术界关于它们的文化属性及其年代多有不同认识。有学者认为,“老铁山、将军山积石墓应是双砬子一期文化的墓葬”〔8〕;或认为“老铁山与将军山积石冢不属于小珠山五期文化,而应归于双砬子一期文化”,而双砬子一期文化晚于小珠山五期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时代〔9〕。小珠山五期文化以小珠

〔1〕 王迅:《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8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2〕 孙波认为,诸城石河头和文登呷里店石椁墓“这类石棺墓独处于山头,加之又基本分布于胶东沿海,可能是受到辽东积石墓传统的影响”(孙波:《聚落考古与龙山文化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3〕 张志立、陈国庆:《东北地区石质葬具综述》,《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1987)》,文物出版社,1990年。

〔4〕 旅大市文物管理组:《旅顺老铁山积石墓》,《考古》1978年第2期。

〔5〕 澄田正一、秋山进午、冈村秀典:《1941年四平山积石墓的调查》,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四),文物出版社,1997年。

〔6〕 高芳、华阳、霍东峰:《文家屯积石墓浅析》,《博物馆研究》2009年第3期。

〔7〕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东半岛石棚》,117—119页,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8〕 赵宾福:《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121—124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

〔9〕 徐昭峰:《辽东半岛南端考古学文化编年与谱系》,《考古学报》2019年第2期。

山遗址第 3 层为代表<sup>〔1〕</sup>,学术界一般称之为小珠山上层文化。考古学界一般认为,四平山积石墓和文家屯东山积石墓等属于小珠山五期文化即小珠山上层文化,其绝对年代或认为是公元前 2830—前 2130 年<sup>〔2〕</sup>,或推定为公元前 2500—前 2000 年<sup>〔3〕</sup>。如此说来,辽东半岛最早的石构墓葬是积石墓,其发生年代不会早于公元前 2500 年前后的小珠山上层文化时期。关于其来源,鉴于辽宁西部的朝阳市牛河梁遗址<sup>〔4〕</sup>、半拉山墓地<sup>〔5〕</sup>等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丰富的石棺墓和积石墓遗存,其年代可以上溯到公元前 4000—前 3000 年左右的红山文化时期,并且辽东半岛史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明显受到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等史前文化的影响<sup>〔6〕</sup>,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辽东半岛的积石墓是辽西地区石棺墓和积石墓东传的结果<sup>〔7〕</sup>。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积石冢不排除本地起源的可能性”<sup>〔8〕</sup>。

但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一方面,辽东半岛的史前文化与辽西地区关系密切的同时,实际上跟山东半岛尤其是胶东半岛史前文化的联系更为密切<sup>〔9〕</sup>,接受的影响更广泛、更深刻,并且辽东半岛“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到岳石文化的整个时期都受到山东半岛的强烈影响,而山东半岛则基本上看不到任何辽东半岛的影响”<sup>〔10〕</sup>。“大汶口文化与辽东半岛的交流是通过胶东半岛来完成的——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间的交流始于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胶东半岛对辽东半岛的文化影响是主要的和强烈的,而辽东半岛对胶东半岛的影响是微弱的”<sup>〔11〕</sup>。“辽东半岛的积石冢的陶器所表现出的文化特征与山东半岛的龙山文化陶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sup>〔12〕</sup>。最新的研究表明: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之间,距今 7000—6000 年的小珠山下层文化和白石村类型文化时期,两地之间可能已经有了文化上的接触和联系;距今 6000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长海县小珠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9 年第 5 期。

〔2〕 张雪莲、金英熙、贾笑冰:《辽宁长海小珠山遗址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考古》2016 年第 5 期。

〔3〕 杜战伟、赵宾福:《小珠山上层文化分期与年代研究》,《考古学报》2021 年第 3 期。

〔4〕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 年。

〔5〕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市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的发掘》,《考古》2017 年第 2 期;《辽宁朝阳市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考古》2017 年第 7 期。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344、353—356、37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

〔7〕 关于辽东半岛积石墓的起源,贺伟认为:“辽东半岛的积石墓习俗有可能源于红山文化的积石墓。”参见氏著:《关于辽东半岛早期墓葬的探索》,张学海主编《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 6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 年。徐昭峰认为,小珠山五期文化“陶器特征上以海岱龙山文化占据较大比例,但在墓葬形制上体现的则是源于辽西区的积石冢这一文化因素,虽然积石冢的形制由于时间的推移发生了一些变化”。参见氏著:《辽东半岛南端考古学文化编年与谱系》,《考古学报》2019 年第 2 期。

〔8〕 张翠敏:《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积石冢再探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庆祝郭大顺先生八秩华诞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8 年。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378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

〔10〕 严文明:《胶东考古记》,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烟台市博物馆《胶东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 年。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312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

〔12〕 王禹浪、崔广彬:《辽东半岛的贝丘、积石冢与大石棚文化》,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考古文集》第一集,科学出版社,2011 年。

—4400 年的小珠山中层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时期，两个半岛之间的文化联系日益增多；距今 4400—3300 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来自渤海海峡南岸的人们，使得辽东半岛延续长达二千余年的本地传统文化发生改变，“成为海岱文化区一个新的分布区”〔1〕。另一方面，正如本文所述，胶东半岛东端的文登吻里店发现有石椁墓地，甚至存在着由吻里店、石崮山等构成的石椁墓群，其年代为公元前 2700—前 2500 年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尽管存在着较大的年代缺环，但吻里店石椁墓源于苏东北的大伊山石椁墓、经鲁东黄海沿岸扩散而来的轨迹是清楚的；况且，胶东半岛东端的乳山南黄庄一带还发现了公元前 9 世纪前后的石椁墓群，反映出石椁墓传统在当地的延续，并被视为当地的文化特色之一〔2〕。

综合上述分析或可得出这样的认识：胶东半岛的石椁墓显然不是辽东半岛积石墓跨越渤海海峡南向扩散的结果；如果说两个半岛新石器时代的石构墓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那么，最大的可能是苏鲁黄海沿岸石椁墓经胶东半岛和渤海海峡向北扩散，对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晚期及后来的墓葬形式产生了影响。当然，辽东半岛石构墓葬的出现或许并非仅仅是源于山东半岛石椁墓的北传，很可能同时也受到了辽西地区石构墓葬东传的影响，是南来和西来共同作用的结果。换言之，约当公元前 2500 年前后，胶东半岛上石椁墓人群的一部分人跨越渤海海峡到达辽东半岛之后，在继承本部族原有的石椁墓传统的基础上，又吸收了来自辽西地区的积石墓和石棺墓等文化因素，于是开始采用积石墓这种新的墓葬形式。当然，对于辽东半岛积石墓和石椁墓等石构墓葬的起源，以及南黄庄石椁墓“会不会是辽东半岛与胶东半岛一支有亲缘关系的族群回迁”等〔3〕，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无论如何，苏鲁黄海沿岸史前至商周时期石椁墓的起源、演变、扩散及其动因的综合分析，不仅有助于我国东部沿海以及东北地区石构墓葬及其所反映的文化和人群移动的深入考察，而且对于“环黄海之路”〔4〕早期形成的研究等，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附记：本文插图由李淼、田苗同志等协助制作，谨此一并致谢。

〔1〕 栾丰实、武昊：《渤海海峡两岸史前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庆祝郭大顺先生八秩华诞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8 年。

〔2〕 王迅认为，胶东半岛发现的石椁墓等可能与东北地区有一定关联，“但石棺墓（即本文之石椁墓——引者注）既然在龙山时代已被山东土著居民所使用，在胶东地区，从山东龙山文化到岳石文化、胶东类型的商代文化、周代土著文化的发展线索清楚，传承关系明确，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胶东地区周代的石椁墓和石棺墓（按：均指乳山南黄庄的石椁墓）来源于当地更早的土著文化，应当视为当地文化特色之一”（王迅：《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97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

〔3〕 王富强：《胶东滨海廊道早期形态初探》，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海岱丝语——“一带一路”与山东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20 年。

〔4〕 白云翔：《“环黄海之路”的提出及其要义》，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海岱丝语——“一带一路”与山东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20 年。

## PREHISTORIC TO SHANG AND ZHOU STONE COFFIN TOMBS IN YELLOW SEA COASTAL REGION OF JIANGSU AND SHANDONG

*by*

Bai Yunxiang

In the Yellow Sea coastal region of Jiangsu and Shandong provinces, vertical earthen pit tombs and those with wooden coffins were the predominant tomb types from the Neolithic Age to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Meanwhile, a small number of stone coffin tombs, constructed with stone slabs or stones inside the earthen pit, were discovered. Over 124 stone coffin tombs have been found in six locations along the Yellow Sea coast. Based on differences in tomb structure, construction methods, and stone materials, these tomb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main categories: Type A (with a lid but no bottom) and Type B (with both a lid and bottom). Each type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subtypes A, B, and C. The popularity of stone coffin tomb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each with distinct tomb types. The early stage, dating from around 4500 to 3500 BCE, was characterized by Type A-A tombs, exemplified by the Guanyun Dayishan site. The middle stage, dating from around 2700 to 2400 BCE, featured Types A-A, A-B, B-A, and B-B tombs at sites such as Rizhao Donghaiyu, Rizhao Sujiacun, Zhucheng Shihetou, and Wendeng Yanglidian. The late stage, associated with local cultural remains from the ninth century BCE and surrounding periods, saw the prevalence of Type A-C and Type B-C tombs at the Rushan Nanhuangzhuang site. Stone coffin tomb sites mainly come in two forms: pure stone coffin tomb sites, such as Dayishan, Shihetou, Yanglidian, and Nanhuangzhuang; and mixed sites, where stone coffin tombs are interspersed among ordinary vertical earthen pit tombs, with smaller numbers found at locations like Donghaiyu and Sujiacun. After first appearing in northeastern Jiangsu around 4500 BCE, stone coffin tombs gradually spread outward. Although they reached the Tai'an Dawenkou site in the northwest inland around 4200 BCE, the main expansion began along the west coast of the Yellow Sea around 2700 BCE and even crossed the Bohai Strait to the Liaodong Peninsula around 2500 BCE. This spread was accompanied by human migration.

责任编辑: 黄益飞